

副文本视域下《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安乐哲译本为例

易红波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安乐哲在《道德经》译本中将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研究发现:正文本翻译前,通过副文本阐述译者重译典籍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哲学语境的建构;翻译中,阐明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读者服务意识;翻译后,再现道家哲学语境,并彰显译者的翻译惯习。译者发挥主体性利用副文本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多重语境,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道德经》;副文本;译者主体性;安乐哲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翻译即诠释,译者作为源文本的诠释者,可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决定采用何种诠释模式,以达到准确传递源文本思想内涵的目的,而副文本是帮助译者实现翻译目的的重要手段。副文本不仅有助于译者有效传递源文本的内涵,还能向读者提供理解源文本所需的历史、文化、哲学等背景信息,促进源文本在异域文化中的理解与传播。《道德经》是最早在西方传播的中国典籍之一,迄今已有近600个西语译本,是除《圣经》之外被译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1],其译本研究可探明中国典籍外译的发展脉络^[2]。安乐哲(Roger T. Ames)与郝大维(David L. Hall)合译的《道德经》译本采用了多种副文本,除序言与致谢外,译者通过导论、注释、主要术语释义、附录等对其中的哲学概念、历史和文

化背景等进行了详细阐释。副文本研究可探究译者行为^[3],故笔者以安乐哲《道德经》译本为例,从翻译活动前、中、后3个方面探讨译者如何利用副文本凸显其主体性地位。

一、副文本与译者主体性

副文本(paratext)指“描述和协调正文本与读者间关系,用以呈现作品的一切语言和非语言材料”^[4]。通过导论、注释等副文本,还原源文本丰富的语言、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保留源文本的文化特质,让读者置身于译者构建的文化网络中,体验他者文化的独特魅力。副文本有效弥补了因语言转换导致的文化误读,减弱了译入文化对译出文化的消极影响,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源文本的文化蕴涵。但添加何种类型的副文本及如何编

收稿日期:2023-03-17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2AH052346);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1097)

作者简介:易红波(1978—),男,湖北应城人,副教授。

排布局,一切都取决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不同社会、文化语境的局限,以及译者知识储备的差异,对源文本跨语言文化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此,源文本思想内涵的传递不仅是源文本内容的翻译,更是译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结果。译者在理解源文本内涵的基础上,根据其翻译目的,通过副文本对源文本进行再次加工。译者主体性决定了副文本的选择和组织,其应用充分凸显了译者解读源文本的主体意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两者协同作用,帮助译者实现翻译目的。

二、安乐哲《道德经》译本中的副文本和译者主体性

1. 翻译活动前

翻译正文本前,通过历史导论、哲学导论、主要术语释义、翻译导论等副文本,安乐哲阐述了重译《道德经》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道家宇宙观,让读者阅读译文前置身于译者建构的道家哲学语境中,为其理解中国古典哲学奠定了基础。

(1) 重译缘起

1788年,《道德经》的第一个拉丁译本诞生,其后200余年时间里新译本不断涌现,其译入语言几乎涵盖了所有欧洲主要语言^[5]。既然如此,为何要重译这部中国典籍呢?安乐哲^[6]在其译本的“序言与致谢”部分和与译本相关的访谈^[7]中详细阐述了重译典籍的4个理由。首先,新文本的出现。帛本和竹简本的出现不仅为《道德经》的深入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解决文本中困扰已久的一些语言问题。其次,文本的哲学地位尚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道德经》作为蕴涵丰厚的哲学著作,无论是传教士的宗教性诠释,还是汉学家的以西释中,都未能彰显其固有的哲学特质。再次,语言因素。译者依然在使用已被文化偏执污染得面目全非的语言翻译中国典籍,这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翻译语言的运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扭曲。最后,时代需求。每一代人都应根

据时代发展需求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先哲们的优秀思想,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故重译中国典籍是时代赋予的任务。基于以上考量,安乐哲参考新发现的文本,从哲学诠释的角度重译《道德经》,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2) 翻译目的

西方要么将中国哲学神学化,要么将其描述为诗性十足、满是玄妙的世界观,两者都严重矮化了中国哲学^[6]。随着比较哲学运动的发展,中国哲学在西方虽受到了一些关注,但仍没摆脱使用西方哲学范畴对其进行诠释的局限。安乐哲受过严格的哲学和语言学教育,郝大维是美国大学的哲学教授,两人从哲学角度诠释《道德经》,建构了基于中西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新范式。《道德经》的哲学诠释有利于加深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7]。

(3) 底本的选择

影响最大的《道德经》抄本或注本有4种: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河上公的《道德经章句》或《河上公章句》、帛本及竹简本。帛本出土前,译者多以王弼本或河上公本为底本;帛本出土后,译者多以此为底本,同时参照其他抄本或注本。刘殿爵的《道德经》译本(*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和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的《道德经》译本(*Lao-tzu: Te-Tao Ching*)均以帛本为底本,且帛本中的语法虚词为解决困扰已久的文本问题提供了新的突破口^[6]。鉴于此,安乐哲^[6]在“翻译导论”中明示:以刘殿爵译本中的中文文本为底本,采用王弼本的章节安排,同时参考竹简本和其他译者的底本。

(4) 哲学语境的建构

文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译者只有重构源文本的语境,才能传递出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翻译正文本前,通过“哲学导论”^[6],安乐哲让读者置身于译者建构的哲学语境中,加深其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安乐哲认为《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内涵是阐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点”(Focus)与

“域”(Field)的关系;如何最大程度地受益于“点”,进而构成“域”的综合体,后又反哺于“点”。故安乐哲将题名“道德经”进一步阐述为“Make This Life Significant”,强调人既受益于道家宇宙观,同时也是宇宙的积极参与者。通过“主要术语释义”,安乐哲详细阐释了《道德经》中的关键术语。先译者只是给术语提供了“字面的”“保守的”翻译,弱化了源文本的历史文化根基,这种翻译模式是对源文本的严重损害^[6]。术语翻译应立足于道家宇宙观的过程性解读,让源文本回归至其产生、发展的原生语境中,进而彰显《道德经》的哲学特征。以“道”的翻译为例,安乐哲^[6]首先从词源上对“道”进行了解读,将“道”译为“way-making”,而非常见的“the Way”。该翻译不仅体现了“道”的三重语义,即动力(momentum)意涵、求道途中的主动性(proactive role)、“道”兼动词(leading-forth, guiding and manipulating of experience)和名词(pathway)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道家宇宙观的核心思想,即人类主动与万物互动,并建构自身的经验域,进而将其提升为“焦点人物”,即“得道者”。

正文本翻译前,安乐哲利用其语言学和哲学教育背景,详细阐释了《道德经》的哲学内涵,并基于道家宇宙观、辅以中西哲学对比对主要术语的翻译进行了语言和哲学解读,试图将源文本置于其生长的哲学语境中,加深读者对《道德经》哲学蕴涵的品鉴。

2. 翻译活动中

翻译源文本时,为使译文更简洁,译者会将大量解释性信息以副文本形式呈现于译文后,以此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译文内容。首先,题名“道德经”汉语拼音的翻译和主要术语的语义簇(language clustering)翻译揭示了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此外,安乐哲在每章译文后添加了注释和注解,为读者理解道家典籍精髓建构了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体现了译者强烈的读者服务意识。

(1)“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

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8]。为实现对《道德经》进行哲学诠释的目的,基于中西对比的哲学框架,安乐哲采用了“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道德经”的汉语拼音翻译。安乐哲将“道德经”译为“Daodejing”,采用了汉语拼音,而其他译者(如 Arthur Waley, Wing-tsit Chan, Robert G. Henricks 等)大多采用威妥玛拼音将其译为“Tao Te Ching”。晚清时威妥玛拼音较为流行,1958年汉语拼音普及后才将其废弃不用。安乐哲采用汉语拼音翻译“道德经”,而非采用威妥玛拼音,既体现了其翻译的独特性,凸显了“中国式叙述”的特质,也有利于中国典籍专业术语外译采用汉语拼音的翻译模式在西方的推广与接受。

②语义簇的术语翻译。文本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只有在原阐释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即翻译文本必须让文本自己发声。常青等^[7]认为,要让文本自言其说,必须将语义簇的术语置入文本的阐释语境中。安乐哲^[6]将语义簇的翻译策略定义为:若某一术语在文本中多次出现,且每次出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继而产生一簇簇相互关联的语义,则该术语的语义价值通过分析语境中的一系列意义而获得。简而言之,术语的翻译应根据其出现语境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但這些词的语义彼此关联,共同构成术语的语义簇。“万物”是《道德经》的关键术语之一,在安乐哲译本的底本中累计出现了17次,注解^[6]中将其译为“the myriad things”和“multiplicity”,正文本中的译文为“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第一、第四、第四十二章)、“all that happens”(第二章)、“things”(第五、第五十一章)、“everything”(第八、第四十二章)、“all things”(第十六、第三十二、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六十四章)、“the things of this world”(第七十六章)等。道家宇宙观认为,过程重于实体,连续性重于非连续性,故对“物”的解读既要体现过程性,也要体现事件性,突出万物

都有其产生、生长、成熟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连续性过程^[6]。

语义簇的术语翻译彰显了道家的宇宙观,体现了术语在文本中连续变化的过程,所有翻译都必须围绕术语这个焦点,共同构成术语的语义域。此外,术语英译后通常伴有对应的汉语拼音和汉字,此翻译方法不仅凸显了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也有利于让读者原滋原味地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2) 语言语境的建构

安乐哲^[6]在“翻译导论”中明示:以刘殿爵译本中的中文文本为底本,同时参照竹简本、王弼本以及其他译者的研究成果,故译文后的注释多涉及文本内容、语义解释、与先前译本的对照等。

①文本内容类注释。帛本和竹简本与权威的王弼本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说明此前存在一个更完整的通行文本,只是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以致后世文本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为使读者全面了解《道德经》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安乐哲在译文后对源文本间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如安乐哲对第一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的注释:帛本中无“之玄”,刘殿爵根据王弼本进行了添加^[6]。译文后共有206条注释,其中,王弼本出现80次,帛本出现85次,竹简本出现68次,刘殿爵本出现26次。提供不同文本的文字信息,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道德经》的具体内容,而且体现了译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真正做到了“字字必较”,只为尽力重现《道德经》的真实面貌。

②语义解释类注释。中哲西传大儒陈荣捷曾说,《道德经》行文晦涩难懂,翻译时常觉难以下手^[5]。由此说明,如何理解源文本表达的意义是译者面临的头等难题,将自身对文本的理解进行跨语言翻译,且让读者理解,则是译者必须解决的下一个难题。为了让读者理解译文内容,译者有时需对译文作必要的解释,以免产生误解。安乐哲在译文后添加多条注释,解释其对源文本的理解。如第二十三章“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

同于德”,安乐哲^[6]在注释中说明:该节意思不明,译者各有不同解读,但其中“道”与“德”的共生关系是明确的。言外之意,该节译文只是译者的一家之言,读者若要深究,则需进一步查阅资料。提供与源文本有关的语义注释,向读者交代译者理解文本的过程,不仅有利于读者与译者产生共鸣,也有助于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源文本所表达的真实意涵。

③与先前译本的对照类注释。译本是译者对源文本理解的跨语言再现,译者利用副文本与之前的译本进行对照,以此凸显其特色。安乐哲在封面上突出了其译本的两大特色:哲学诠释(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和竹简本底本关照(Featur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Bamboo Texts),旨在告诉读者该译本是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区别于先前的神学或文学类解读,且参考了最近发现的竹简本。此外,译文后的注释多次提到该译本与此前译本间的差异。如第五十二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注释说明帛本中为“堇”,是“勤”的缩略字,意为“苦干”和“用完”,刘殿爵将“不勤”译为“will not run dry”^[6],而安乐哲将其译为“will not be used up”。典籍重译不是重复以前译者的工作,而是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典籍蕴含的思想内涵,并让其在异域生根发芽。通过与先前译本的对照,彰显了自身译本的特色,不仅有助于提高译本的接受度,也有利于让典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道德经》本就艰深晦涩,受过专门训练的汉学家尚有此感,更遑论普通读者。安乐哲在译文后添加多条与文本内容和语义解释相关的注释,同时,通过注释与先前译本进行对照,让读者置身于《道德经》文本不断演变的历史和其跨语言传播的广阔情境中,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语境。

(3) 文化语境的建构

除建构语言语境外,安乐哲还利用译文后的注释建构了丰厚的文化语境。文化类注释是最常见的注释,用于扩充源文本的文化

传统惯习和社会背景信息,以此重构源文本的文化语境,帮助读者顺畅地阅读和理解文本^[9]。安乐哲《道德经》译文后的文化类注释主要涉及中国古代祭祀、称谓等文化现象,如第五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被译为“straw dogs”,意为“稻草狗”或“不值钱的狗”,注释说明“刍狗”指祭祀用的编织物,仪式结束后就被丢弃^[6]。《道德经》虽是道家哲学经典,但其哲学阐述中也蕴藏着厚重的中国文化元素。安乐哲通过注释为读者建构了意涵丰富的中国文化语境,既降低了读者理解译文的难度,也让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道”在人类生活中的强大渗透力。

(4) 读者服务意识

译本只有被他国读者接受才能真正起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从而推进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有效传播。《道德经》每章译文后都附有基于译者对源文本理解的注解,为使读者易于接受,同时增强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安乐哲引用了大量中国哲学典籍和国外相关著作,同时利用了章节间的互文性特征。在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的注解中,安乐哲首先说明了宠辱不惊的重要性,接着解释了前两句的内涵,并认为本章的意涵与第七章相反,但与《庄子·在宥》中的观点相同^[6]。注解是译者对于源文本的理解和进一步思考,也是其与读者互动交流的催化剂,不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突显了译者为读者服务的翻译思想。

翻译活动中,译者运用“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准确传达了道家哲学的思想内涵,同时,利用译文后旁征博引的注解和多类型的注释为读者重构了厚实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加深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对“道”的再认识,彰显了译者强烈的读者服务意识。

3. 翻译活动后

正文本翻译完成后,译者在“附录”中提供了与竹简本一同被发现的《太一生水》文本、译文及译前导言,进一步凸显了译本的哲学特征,同时彰显了译者的翻译惯习。

(1) 再现哲学语境

在《太一生水》的译前“导言”中安乐哲^[6]指出: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太一生水》是《道德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所知最早记录中国宇宙论的文本,对理解道家宇宙观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太一生水》的核心内涵是:太一生于水,又隐于水,与水协力创造了天地;万物处于连续不断的循环中,当发展至高度完善时便会转向其对立面,继而进入下一轮循环。其他学者证实了安乐哲对《太一生水》的理解,玄华^[10]认为《太一生水》独立依附于《老子》文本的开头或结尾。《太一生水》前半部分讲述基于“太一”的宇宙创生过程,后半部分说明“太一”在现实中显现的具体样态,即在“创生”和“显现”中讨论“道生万物”的过程^[11]。显然,安乐哲接受《太一生水》附于《老子》结尾的观点,并将其视为进一步阐释《道德经》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太一生水》思想内涵的阐释,读者可进一步窥视《道德经》的全貌,再次进入译者建构的道家哲学语境,加深对道家哲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2) 彰显译者翻译惯习

作为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知名汉学家,安乐哲“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先锋”^[12],除出版中国哲学研究著作外,还英译了多部中国哲学典籍。安乐哲在每部译本中都精心组织副文本,以此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译文和中国典籍蕴含的哲学思想,这已成为其显著的翻译惯习。副文本通常包括导论、核心术语释义和附录等,其中,导论多涉及典籍的历史、语言、哲学背景等。这种翻译惯习有利于译者厘清中西哲学两种不同的阐释语境,进而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性诠释,达到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国哲学本质的目的^[12],以此突破中国哲学神学化和西方理论框架的桎梏。

正文本翻译完成后,安乐哲添加了以《太一生水》为主题的附录,再次构建了道家的哲学语境。同时,附录与其他副文本元素一起构成了安乐哲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惯习,这不仅成为其译本的重要特色,也让读者

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无穷魅力。

三、结 语

安乐哲兼具汉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在《道德经》翻译的全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一方面精心挑选底本并深入理解源文本的内涵,另一方面利用自身语言学和哲学教育背景,通过多种副文本的精妙组合为读者建构了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哲学语境,准确再现了道家哲学的精髓,使该译本成为中国古典哲学对外译介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 杨柳,范娟.《道德经》的美学特色与翻译[J]. 江苏社会科学,2014(6):179-183.
- [2] 林昊,刘富华,吴明海.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翻译特点研究[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6):623-627.
- [3] 于洋欢,朱源,董雁.副文本:翻译研究的另一扇窗口;凯瑟琳·巴特勒新著《翻译与副文本》评介[J]. 中国翻译,2019,40(6):96-102.
- [4]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刘玲娣.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6):136-149.
- [6] 安乐哲,郝大维.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 何金俐,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7] 常青,安乐哲.安乐哲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观:从《道德经》的翻译谈起[J]. 中国翻译,2016(4):87-92.
- [8] 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2014,35(3):82-88.
- [9] 林嘉新,徐坤培.副文本与形象重构:华兹生《庄子》英译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 外国语,2022,45(2):111-120.
- [10] 玄华.论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文本内涵、结构与性质[J]. 中州学刊,2013(8):111-116.
- [11] 吴贤重.《太一生水》自然法思想研究[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4(6):14-22.
- [12] 郭薇,辛红娟.哲人译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路径探析: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5):139-147.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esearch of *Daode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s: Taking Ames' Translated Version as an Example

YI Hongbo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appropriate use of paratexts manifest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mes demonstrates his subjectivit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Daodejing*. Before translating the main text, Ames employs paratexts to illustrate the reasons and the purpose of retranslating *Daodejing*, the choice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while translating, he explicat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narr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translators' reader service awareness; after translating, he reoccurs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of Taoism and reveal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habitus. Directed b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mes employs paratexts to construct manifold contexts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order to improv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row insights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Daodejing*; paratex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oger T. Ames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